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0.05.008

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促进中国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吗?

——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沈琳¹, 彭冬冬²

(1.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2.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生态文明教研部, 福建福州 350001)

摘要: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反倾销;多产品出口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竞争促进效应;中美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114;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0)05-0082-15

一、引言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被进一步激化,而反倾销是各国最为常用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也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

* 收稿日期:2020-06-20;修回日期:2020-07-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JY045);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FJ2018C047)

作者简介:沈琳(1989),女,福建龙岩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学研究;E-mail:zzshenlin@163.com。

通信作者:彭冬冬(1987),男,山东青岛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学研究;E-mail:pengdongdonggood@163.com。

国家。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共遭遇27起反倾销调查,居于全球首位,比排在二位的韩国高出17起。其中,美国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有20%以上是美国发起的。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反复的背景下,科学评估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对于探寻有效的应对之道具有重要意义。

遭遇反倾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关于国外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众多文献证实,国外对华反倾销通过促使在位企业退出、减少新企业的数量和出口规模等机制(Lu et al, 2013; 罗胜强等, 2018)^[1-2],显著地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王孝松等, 2014, 2015; 蒋为等, 2016)^[3-5]。除了贸易限制效应外,国外对华反倾销还具有贸易转移、贸易偏转等效应(沈国兵, 2008; 向洪金, 2008; 杨仕辉等, 2012; 冯宗宪等, 2010; Zhu, 2017; 龙小宁等, 2018)^[6-11]。也有部分文献就国外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比如,谢建国和章素珍(2017)研究发现,美国反倾销调查对中国被裁决为具有倾销行为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1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出口企业绝大多数是多产品企业,多产品出口企业主导了中国的出口贸易(钱学锋等, 2013)^[13]。根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数据,2013年中国75%的出口企业为多产品企业,多产品企业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更是高达94%。因此,国外对华反倾销时,并不是企业所有的出口产品都受到了反倾销的影响。那么,国外对华反倾销是否会影响多产品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 如果会,其内在的机制是什么? 现有文献对此鲜有探讨。关于多产品企业不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多从投入品质量、目的地市场规模等方面进行考察(Manova et al, 2012, 2017)^[14-15]。有鉴于此,本文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例,重点研究国外对华反倾销对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拓展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发现,国外对华反倾销会显著提升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而贸易偏转效应所引致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对华反倾销促进中国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之一。该结论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综合影响,帮助政府和企业面对频发的贸易摩擦时趋利避害,化危为机。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与本文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国外对华反倾销的贸易效应,二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影响)因素。Bown和Crowley(2007)将反倾销对受影响国出口规模的影响(即贸易效应)分为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和贸易抑制效应^[16]。关于国外对华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大量文献从多层面证实了贸易破坏效应(Lu et al, 2013; 王孝松等, 2014, 2015; 蒋为等, 2016; 罗胜强等, 2018)^[1-5]、贸易转向效应(沈国兵, 2008; 向洪金, 2008; 杨仕辉等, 2012)^[6-8]和贸易偏转效应(龙小宁等, 2018)^[11]的存在。美国对华反倾销在导致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口减少的同时,也使其他竞争国同类产品对美国出口增加,并显著增加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反倾销除了会影响出口规模外,还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但相关研究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些文献研究发现,反倾销调查对受调查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负面影响(谢建国等, 2017)^[12];另一些文献分析认为,企业在遭受反倾销后受调查出口产品的质量会有所提升(高新月等, 2020)^[17]。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很多,包括劳动力供给、产业集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市场规模等(铁瑛等, 2019; 苏丹妮等, 2018; 林正静, 2019; 殷德生等, 2011)^[18-21]。对外开放是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Fan et al, 2015; 许家云等, 2017; 李坤望等, 2015)^[22-24]。由于中国出口企业大多有多种产品出口,出口目的地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中间投入品质量的不同会导致企业内部不同出口产品的质量存在差异(Manova et al, 2012, 2017)^[14-15]。

总而言之,已有研究证实反倾销是影响受调查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多产品企业内部各出口产品的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但反倾销是否会对多产品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产生影响? 相关研究

尚未涉及。从理论上讲,本文认为多产品企业受到反倾销影响后,其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会有所提升,即反倾销对受影响企业的非倾销出口产品具有质量溢出效应,其内在机制如下:

多产品出口企业在遭遇反倾销后,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非倾销产品的出口(冯宗宪,2010;Zhu,2017;龙小宁等,2018)^[9-11],即存在贸易偏转效应。其原因在于:反倾销使得被调查产品出口到反倾销发起国的贸易成本上升,而非倾销产品出口到反倾销发起国的贸易成本相对降低。在此情况下,多产品出口企业会通过向反倾销发起国出口更多的非倾销产品来弥补损失。同时,反倾销所引致的贸易偏转效应会进一步产生竞争促进效应。由于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出口的产品具有明显的国别特征。比如,高收入国家专业化生产高质量产品而低收入国家专业化生产低质量产品(Hummels et al,2005)^[25]。因此,当所有受反倾销影响的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非倾销产品的出口时,可能引发出口市场中出口份额的再配置,进而提高出口非倾销产品的竞争程度,即存在竞争促进效应,而竞争程度的加剧会促使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已证实,企业向竞争更激烈的国外市场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Matsa,2011;Ha et al,2013)^[26-27]。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消费者会更加偏好高质量产品,因此企业必须要通过研发创新等方式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许明,2016)^[28]。

上述机制如图1所示,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的多产品出口企业提高其对反倾销发起国出口的非倾销产品质量($H_{1,1}$),反倾销通过贸易偏转效应进而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实现该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①的主要机制之一($H_{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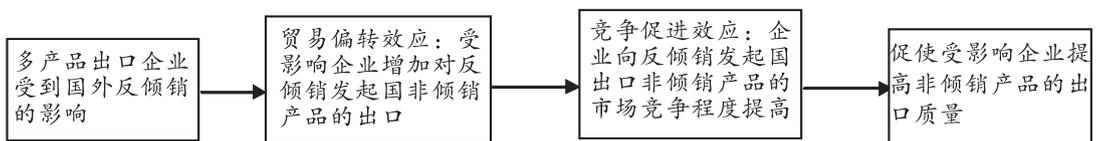


图1 反倾销影响多产品出口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

既然反倾销通过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来促进受影响的多产品出口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而不同的产品或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是有差异的,其面对市场竞争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那么对于不同的产品,反倾销的这种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也应具有异质性。对此,本文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产品进口依赖度的差异。对于反倾销发起国对受影响出口国的进口依赖度较高的非倾销产品,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较小。这是因为,就进口依赖度较高的非倾销产品而言,反倾销通过贸易偏转效应所引致的市场竞争程度加剧会更多地挤出它国企业的市场份额,而不是引起受影响国企业之间市场份额的再配置,换言之,市场竞争加剧相对较小。

二是产品出口目的地的多少。对于出口目的地较多的非倾销出口产品,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较小。这是因为,反倾销通过贸易偏转效应引致非倾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如果企业出口该产品的目的地较多,可以较容易地转移到其他地区进行销售,进而规避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上的激烈竞争。

三是企业内产品等级的不同。对于出口企业内等级较高的非倾销产品,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较小。其原因是,虽然反倾销的贸易偏转效应引致非倾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但如果该非倾销产品是出口企业专业化生产的核心产品,那么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对其市场份额的冲击相对较小。

四是不同企业性质的产品。相对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

^①“反倾销促使受影响的多产品出口企业提高其对反倾销发起国出口的非倾销产品质量”的作用可视为反倾销的一种“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

应较小。由于资本构成、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时的反应是不同的。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利润寻求动机,市场竞争的加剧对其提升产品质量的推动也较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对于不同的非倾销产品,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于进口依赖度较高($H_{2.1}$)、出口目的地较多($H_{2.2}$)、企业内等级较高($H_{2.3}$)、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H_{2.4}$),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较小。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将部分企业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把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企业所生产的非倾销出口产品作为处理组,未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企业所生产的非倾销出口产品作为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体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quality_{iht} = \alpha + \beta AD_{it} + \gamma Z_{ht} + \varphi_t + \varphi_{ih} + \mu_{iht}$$

其中, i 、 h 、 t 分别代表企业、HS 6位产品、年份; $quality_{ih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i 出口的非倾销产品 h 的质量; AD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是否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为简便起见,以下该变量简称“反倾销影响”),是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即 $AD_{it} = T_i \times P_{it}$, T_i 为企业 i 是否受到反倾销影响的虚拟变量^①, P_{it} 为是否受影响的年度虚拟变量^②, $AD_{it} = 1$ 表示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 $AD_{it} = 0$ 表示未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 Z_{ht} 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美国的进口关税以及中国的进口关税; φ_t 为“年份”的固定效应、 φ_{ih} 为“企业×产品”的固定效应、 μ_{iht} 为误差项。

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本文参考Khandelwal等(2013)的做法^[29]:在CES效用函数中引入产品质量,得到需求函数: $x_{iht} = q_{iht} p_{iht}^{-\sigma} P_{ct}^{\sigma-1} Y_{ct}$ 。其中, x_{iht} 、 q_{iht} 和 p_{iht} 分别表示 t 年企业 i 向 c 国出口 h 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 P_{ct} 为进口国的整体价格指数, Y_{ct} 为进口国的国民总支出。两边取自然对数,可通过以下回归方程的残差求出产品质量: $\ln x_{iht} + \sigma \ln p_{iht} = \gamma_h + \gamma_{ct} + \epsilon_{iht}$ 。其中,产品的固定效应(γ_h)控制了导致不同产品价格和需求差异的产品固有特性因素, γ_{ct} 反映出口目的国总体价格水平及国民总支出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可表示为: $quality_{iht} = \frac{\epsilon_{iht}}{\sigma-1}$ 。参考Fan等(2015)的做法^[22],利用Broda和Weinstein(2006)提供的产品间替代弹性计算出HS 2位行业的 σ 平均值^[30],然后结合出口数量和价格估算出口产品质量。这种估计方法的经济逻辑是:在给定产品价格的情况下,企业的出口数量越多,则其出口产品的质量越高。

本文主要在“产品×年份”的维度上选取了两个控制变量:一是“美国进口关税”。作为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目的国的进口关税是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Bekkers et al, 2016)^[31];二是“中国进口关税”。本国的进口关税也是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Amiti et al, 2013)^[32]。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采用三组数据:一是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来自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③。该数据库包含企业的进出口交易记录,其内容包括企业编码、企业名称、商品的HS 8位编码、出口数

① 如果在2000—2013年企业 i 有出口产品被最终裁决为倾销产品,则企业受到反倾销的影响, $T_i = 1$,否则 $T_i = 0$ 。

② 如果企业在 t 年受到反倾销影响,则从 t 年到2013年 P_{it} 均为1,否则为0。参考Lu等(2013)的做法^[1],选取损害裁定日期作为终裁的判决日期。

③ 本文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但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不是完全公开的数据库,笔者仅能获得2000—2013年的数据,因此实证分析的时间区间为2000—2013年。

量及金额、贸易方式、出口目的地以及进口来源地等。二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数据,来自全球反倾销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1980—2015年WTO成员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具体信息,如反倾销案件的发起国、被调查国、涉及的HS6位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时间、初裁和仲裁的结果、确认倾销的时间、确认伤害的时间以及最后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等。三是中美两国HS6位产品层面的进口关税数据,来源于WITS数据库。

数据处理过程如下:第一,删除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的贸易中间商。借鉴Ahn等(2011)的做法^[33],将企业名称中包含“贸易”“科贸”“进出口”“经贸”“工贸”“外经”以及“外贸”等字眼的样本剔除。第二,将海关贸易数据库中HS8位产品的数据加总到HS6位产品层面。第三,将三组数据中HS6位产品分类标准统一归至HS1996版本,根据统一的HS编码进行匹配。第四,估计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保留对美国的出口数据。第五,剔除遭遇美国反倾销的产品数据。第六,保留与遭遇反倾销的产品属于同一HS4位行业的非倾销产品^①。据此得到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2000—2013年33525家企业共269545个观测值。表1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于只保留了与遭遇反倾销产品属于同一HS4位行业的非倾销产品,样本数据中约有70%的观测值为受影响企业生产的非倾销产品。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可以发现,相较于控制组,处理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较低,并且在美国和中国均面临更低的进口关税。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体					
出口产品质量	269 545	1.031 0	4.271 911	-41.688 41	38.117 34
反倾销影响	269 545	0.708 8	0.454 2	0	1
美国进口关税	269 545	2.221 3	2.521 6	0	14.9
中国进口关税	269 545	9.583 4	7.225 3	0	50
处理组					
出口产品质量	191 074	0.853 7	4.304 6	-40.457 3	38.254 2
美国进口关税	191 074	2.114 6	2.487 3	0	14.7
中国进口关税	191 074	9.105 7	7.043 9	0	38
控制组					
出口产品质量	78 471	1.462 7	4.142 6	-41.688 4	37.615 9
美国进口关税	78 471	2.596 6	2.604 1	0	14.9
中国进口关税	78 471	11.264 5	7.594 7	0	50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是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各列均控制了“年份”和“企业×产品”的固定效应。第(1)列未加入“产品

^①通过选取和遭遇到反倾销的产品属于同一HS4位行业的非倾销产品,使得企业内部非反倾销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确保受到反倾销影响前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具有共同趋势。在众多探讨反倾销贸易效应的文献中(Lu等,2013;孙浦阳等,2016;Zhu,2017;罗胜强等,2019),经常将相同HS4位行业下其他未遭遇反倾销的产品作为控制组,就是因为同一HS4位行业内的产品具有相似性。事实上,本文分析也发现,如果不对样本如此处理,则模型难以满足平行趋势的条件。

x年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反倾销影响”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第(2)列加入控制变量“美国进口关税”,估计系数仍然非常显著,并且其数值有所增大;第(3)列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中国进口关税”,估计系数依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第(3)列的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使得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上升了27.97% ($\exp^{0.2466}-1$)左右,假设 H_{1-1} 得到验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反倾销影响	0.225 9***(4.934)	0.232 3***(5.053)	0.246 6***(5.339)
美国进口关税		-0.205 4***(-7.013)	-0.187 0***(-6.800)
中国进口关税			0.017 6***(3.688)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269 545	269 545	269 545
Adjusted R ²	0.640 8	0.640 9	0.640 9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将标准误差在企业层面聚类得到的稳健t值,除特殊说明外,下表同。

在控制变量方面,“美国进口关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美国的进口关税越高,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越低。这是因为出口目的国关税的提高降低了市场的竞争程度,出口企业进行产品质量升级的动力不足。“中国进口关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的进口关税越高,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高。这可能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总体较低有关,当产品质量远离世界质量前沿时,出口国较高的进口关税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Amiti et al,2013)^[32]。

2.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的前提是处理组和控制组要满足平行趋势的条件,即在企业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以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否则估计量是有偏的。为了验证平行趋势,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quality_{it} = \alpha + \sum_{j=2}^5 b_j AD_{it} + \sum_{j=0}^{13} a_j AD_{it} + \gamma Z_{it} + \varphi_t + \varphi_{it} + \mu_{it}$$

其中, b_j 是一个虚拟变量,当企业在 j 年之后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则该变量取1,否则为0,其刻画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趋势。将美国对华反倾销前一年作为参考标准,如果 b_5-b_2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0,说明样本数据满足平行趋势的条件。 a_j 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当企业在 j 年之前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则该变量取1,否则为0,其刻画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在企业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以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表现为 b_5-b_2 的估计系数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0(90%的置信区间内包含了0值),这说明本文的数据满足平行趋势的条件。此外, a_0-a_{13} 的估计系数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对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边际影响在第二年达到最大,随后开始减弱,并且在第六年及以后消失,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对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趋势。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控制其他因素、更换产品质量测度方法、异常样本处理以及改变

标准误差的聚类方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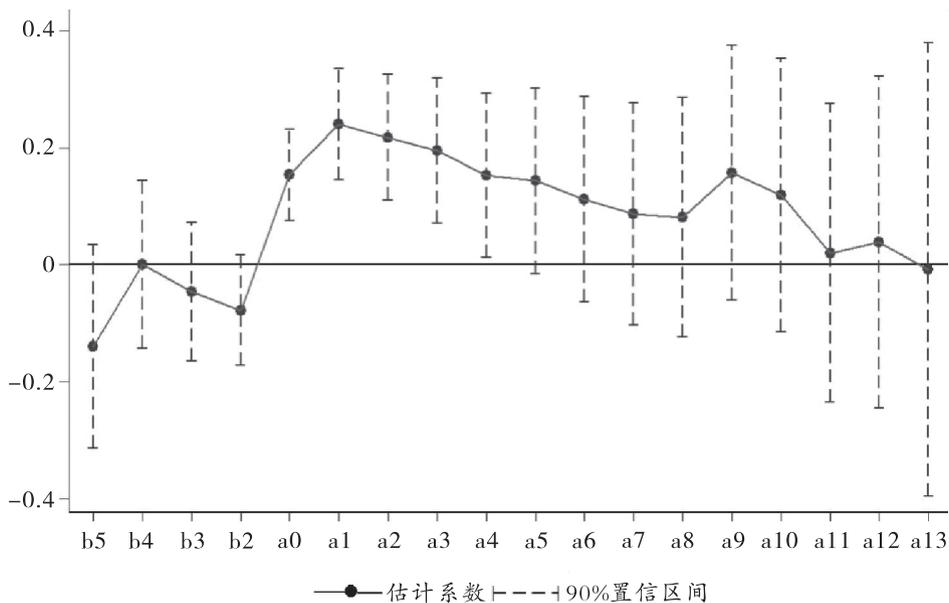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注: b5 的取值方式为, 当企业至少 5 年之后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时取 1, 否则为 0。

(1) 控制其他因素。分别控制“产品×年份”的固定效应^①、“出口产品价格”^②、“生产率”和“规模”^③以及“金融危机”^④的影响, 估计结果见表 3 的(1)~(4)列, “反倾销影响”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且“反倾销影响×金融危机”的系数不显著。为进一步排除未观测因素的影响, 借鉴周茂等(2016)的检验思路进行检验^[39], 估计结果见表 3 的(5)列和图 3, 未观测因素几乎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2) 更换“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一是改变替代弹性 σ 的取值方式^⑤, 二是通过产品价格直接测度“出口产品质量”^⑥, 估计结果见表 3 的(6)(7)列, “反倾销影响”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①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年份”和“企业×产品”的固定效应以及中美两国“产品×年份”层面的关税水平, 以规避遗漏变量问题, 但仍可能遗漏某些难以观测并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变量, 如技术进步、美国发起的其他贸易保护措施等, 进而可能造成估计的偏误。因此, 本文进一步控制“产品×年份”的固定效应。

② 部分企业较低的出口产品价格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直接原因, 同时出口产品价格和出口产品质量相关。因此, 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变量(取自然对数)。

③ 研究发现, 企业的生产率和规模均会显著影响其遭遇反倾销的概率(谢申祥等, 2016)^[34], 也是影响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樊海潮等, 2015)^[35]。因此, 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企业的“生产率”和“规模”变量, “生产率”使用 LP 方法估算(余淼杰等, 2018)^[36], “规模”用企业的就业人数衡量。

④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刘伟等, 2009)^[37], 并使企业倾向于生产低质量的产品, 中国的出口在金融危机期间也出现显著下降(许和连等, 2016)^[38]。为此, 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反倾销影响”与“金融危机”的交乘项, 2008 年及以后“金融危机”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⑤ 前文在计算出口产品质量时, 借鉴文献中常用的做法, 替代弹性 σ 在 HS 2 位码层面取值; 这里, 替代弹性 σ 在 HS 3 位码层面取值, 重新计算出口产品质量。

⑥ 产品价格和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借鉴 Manova 和 Zhang (2012)^[14]的方法, 通过产品价格直接测度产品质量: $qualit_{it} = \log(\text{price}_{it}/\text{ave}(\text{price}_{it}))$ 。其中, price_{it} 为出口产品价格, $\text{ave}(\text{price}_{it})$ 为产品一年份组合中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

表3 稳健性检验(一)

变量	控制其他因素				更换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		
	(1)	(2)	(3)	(4)	(5)	(6)	(7)
反倾销影响	0.177 7*** (4.733)	0.264 3*** (5.411)	0.105 4* (1.867)	0.269 0*** (4.870)	-0.000 4 (-0.471)	0.343 1*** (4.733)	0.025 5** (2.474)
出口产品价格		1.393 4*** (109.616)					
生产率			0.246 8*** (9.651)				
规模			0.000 1*** (5.366)				
反倾销影响× 金融危机				-0.077 5 (-0.6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年份	控制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观测值数	268 791	269 545	95 024	269 545	269 545	269 545	269 545
Adjusted R ²	0.660 8	0.691 0	0.690 1	0.640 9	0.740 0	0.662 5	0.689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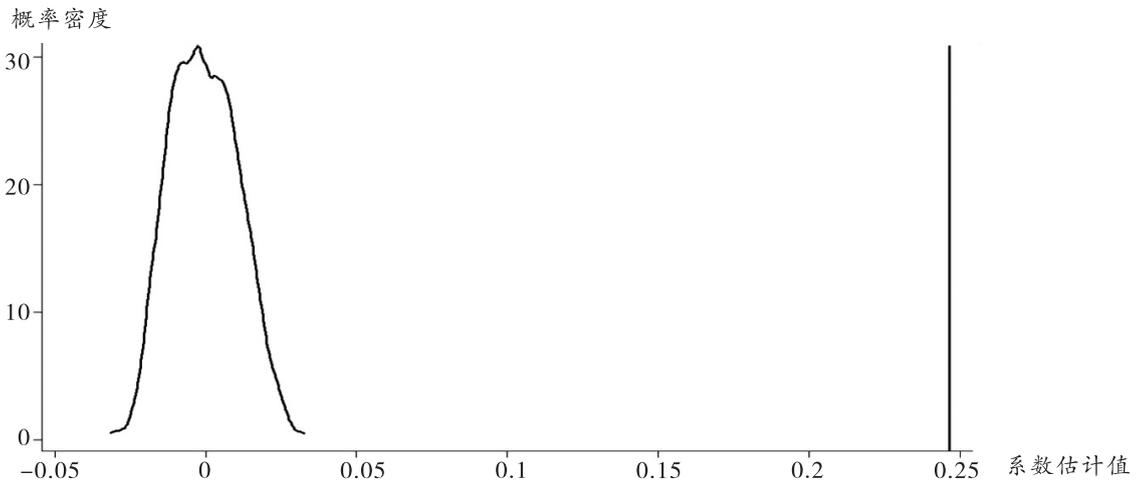


图3 随机处理后估计值的分布

注:根据基准模型得到 AD_{it} 系数估计值 $\hat{\beta}_1$ 表达式: $\hat{\beta}_1 = \beta_1 + \eta \frac{cov(AD_{it}, \mu_{iht} | \omega_{iht})}{var(AD_{it} | \omega_{iht})}$ 。其中, ω_{iht} 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如果 $\eta=0$,则非观测因素不会影响估计结果,但无法直接检验 η 是否为零。如果能找到某个变量替代 AD_{it} ,并且其不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beta_1=0$),再估计出 $\hat{\beta}_1$ 为零,则能证明 $\eta=0$ 。将企业是否遭遇美国反倾销进行随机化(通过计算机随机抽取0或1,随机过程进行200次),随机处理能够保证不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即 $\hat{\beta}_1^{random}=0$ 。估计出 $\hat{\beta}_1^{random}$ 的均值(图3展为200个 $\hat{\beta}_1^{random}$ 的分布)。通过随机处理后得出的估计系数 $\hat{\beta}_1^{random}$ 均值为-0.000 4,与基准结果相比已非常接近于零,并且不显著,因此可以反推 $\eta=0$ 。

(3)异常样本的处理。分别剔除遭遇他国反倾销的产品^①、加工贸易样本^②、在样本期内被取消的反倾销案件^③,并对“出口产品质量”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和截尾处理^④,估计结果见表4,“反倾销影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二)

变量	剔除遭遇他国反倾销的产品	剔除加工贸易样本	剔除样被取消的反倾销案件	出口产品质量1%水平缩尾	出口产品质量1%水平截尾
反倾销影响	0.270 4 *** (5.090)	0.227 9 *** (4.973)	0.202 7 *** (5.081)	0.192 8 *** (4.457)	0.141 9 *** (3.4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234 948	188 884	265 875	269 545	262 742
Adjusted R ²	0.641 2	0.589 6	0.634 5	0.643 8	0.619 0

(4)改变标准误差的聚类方式。在基准回归中标准误差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然而对多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标准误差在哪个层面聚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为此,分别将标准误差在“企业×产品”“企业×年份”“HS 6位产品”以及“HS 4位行业”层面进行聚类,估计结果见表5,“反倾销影响”的估计系数至少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5 稳健性检验(三)

变量	企业×产品层面	企业×年份层面	HS6位产品层面	HS4位行业层面
反倾销影响	0.246 6 *** (4.950)	0.246 6 *** (5.700)	0.246 6 ** (1.967)	0.246 6 * (1.8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269 545	269 545	269 545	269 545
Adjusted R ²	0.640 9	0.640 9	0.640 9	0.640 9

4. 影响机制检验

上文的研究证实了美国对华反倾销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并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下面进一步验证产生这一质量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见图1)。首先,检验反倾销是否具有贸易偏转效应,即美国对华反倾销以后,相对贸易成本的变化是否会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美国非倾销产品的出口。

① 基准回归的样本中所选取的产品是样本期内未受到美国反倾销影响的产品,然而这些产品可能受到其他国家反倾销的影响,因此将受到他国反倾销影响的产品从样本中删除。

② 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贸易方式有十几种,本文基准回归的样本中囊括了所有贸易方式的数据。然而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委托方的要求,企业自身进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动力相对较小。因此,剔除加工贸易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③ 在2000—2013年美国对华发起的并最终被裁决为损害的75起反倾销案件中,有8起的反倾销措施在样本期内又被取消,为了排除这些后来被撤销反倾销的影响,将其删除进行稳健性检验。

④ 由于“出口产品质量”是通过方程估算的,这可能出现异常值,因此在1%水平下进行双边缩尾和截尾处理。

具体地,将非倾销产品的出口金额(取对数)和出口数量(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受到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后,中国企业非倾销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有了更快的增长,其中,出口金额增长了13.58% ($e^{0.1273} - 1$),出口数量增长了15.03% ($e^{0.14} - 1$),表明反倾销的贸易偏转效应是存在的。

表6 反倾销的贸易偏转效应

变量	出口金额	出口数量
反倾销影响	0.1273***(4.954)	0.1400***(5.9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269 545	269 545
Adjusted R ²	0.730 1	0.752 8

注:平行趋势检验表明模型满足平行趋势条件(具体结果备索)。

然后,检验反倾销的贸易偏转效应是否会带来竞争促进效应。可以推测中国企业对美国非倾销产品出口的增加会导致非倾销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加剧。为证明这一推测,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Y_{ht} = \alpha + \theta_1 Treat_{ht} + \theta_2 Pre_{ht} + \eta_t + \eta_h + \mu_{ht}$ 。其中, h 和 t 分别表示HS 6位产品和年份; Y_{ht} 为市场竞争程度^①; $Treat_{ht} = T_h \times T_{ht}$ ^②, $Treat_{ht} = 1$ 表示所属的HS 4位行业有遭遇美国反倾销的产品, $Treat_{ht} = 0$ 表示所属HS 4位行业没遭遇美国反倾销的产品; Pre_{ht} 反映预期效应^③,用以检验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反倾销以前是否具有共同变动趋势; η_t 为“年份”的固定效应, η_h 为“产品层面”的固定效应, μ_{ht} 为误差项。如果 θ_1 显著小于0,则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会提高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非倾销产品时的竞争程度。估计结果表明(见表7),在非倾销产品所属HS 4位行业有产品遭遇美国反倾销后,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这些非倾销产品时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显著提高;同时,预期效应不显著,表明反倾销是导致市场竞争程度提高的主要因素^④。

表7 反倾销的竞争促进效应(产品层面)

变量名	赫芬达尔指数	前五大出口企业出口份额	前十大出口企业出口份额
所属HS 4位行业有产品遭遇反倾销	-0.0146**(-2.470)	-0.0237***(-2.894)	-0.0180***(-2.695)
预期效应	-0.0123(-1.295)	-0.0113(-1.478)	-0.0057(-1.0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50 425	50 425	50 425
Adjusted R ²	0.692 0	0.780 0	0.807 0

注:括号内为将标准误差在HS 6产品层面聚类得到的稳健t值。

① 本文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前五大出口企业出口份额”和“前十大出口企业出口份额”三个指标度量市场竞争程度,这三个指标的数值越小,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② 在样本期内若HS 6位产品所属HS 4位行业有产品遭遇美国的反倾销,则 $T_h = 1$,否则为0;在HS 6位产品所属HS 4位行业初次遭遇美国的反倾销及以后,则 $T_{ht} = 1$,否则为0。

③ $Pre_{ht} = T_h \times Pre_{time_{ht}}$,在HS 6位产品所属的HS 4位行业初次遭遇到美国的反倾销的前一年 $Pre_{time_{ht}}$ 为1,否则为0。

④ 本文也在产品层面分析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对非倾销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后,非倾销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金额和数量有了更快的增长(具体结果备索);在控制出口金额或出口数量后,美国对华反倾销对非倾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效应减弱。

最后,检验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表8的估计结果显示,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总而言之,美国对华反倾销产生的贸易偏转效应加剧了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非倾销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进而促使中国企业提高其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假设 H_{1-1} 得到验证。

表8 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变量名	(1)	(2)	(3)
赫芬达尔指数	-0.812 4***(-8.865)		
前五大出口企业出口份额		-0.682 3***(-10.904)	
前十大出口企业出口份额			-1.128 9***(-14.7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269 545	269 545	269 545
Adjusted R ²	0.640 9	0.641 0	0.641 1

5. 产品异质性检验

为检验进口依赖度差异的影响,在解释变量中引入“反倾销影响”和“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用2000年该产品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来衡量)的交乘项。回归结果见表9的(1)列,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越高的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质量提升效应越小,假设 H_{2-1} 得到验证。

表9 产品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反倾销影响	0.723 0*** (11.932)	0.449 6*** (5.509)	0.198 7*** (4.061)	-0.091 7 (-0.539)	0.121 4 (0.850)
反倾销影响× 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	-1.369 8*** (-7.952)				-1.758 4*** (-5.366)
反倾销影响× 出口目的地数量		-0.046 9** (-2.307)			-0.036 7*** (-5.372)
反倾销影响× 产品的企业内等级			0.004 3*** (3.973)		0.005 8*** (4.361)
反倾销影响× 外资企业				0.412 5*** (4.387)	0.679 8*** (4.774)
反倾销影响× 私营企业				0.322 2** (2.206)	0.622 0*** (4.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252 312	269 545	269 545	269 545	252 312
Adjusted R ²	0.641 9	0.641 1	0.641 0	0.640 9	0.642 2

为检验出口目的地多少的影响,在解释变量中引入“反倾销影响”和“出口目的地数量”(用企业—产品组合第一次在样本中出现时的出口目的地数来衡量)的交乘项。回归结果如表9的(2)列所示,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口目的地的数量越多,反倾销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越小,假设 H_{2-2} 得到

验证。

为检验企业内产品等级的影响,在解释变量中引入“反倾销影响”和“产品的企业内等级”的交乘项^①。回归结果如表9的(3)列所示,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品的企业内等级越高,反倾销对其质量的提升效应越小,假设 H_{2-3} 得到验证。

为检验企业性质的影响,在解释变量中引入“反倾销影响”和“外资企业”的交乘项、“反倾销影响”和“私营企业”的交乘项(根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企业十位编码的第六位数字来识别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回归结果如表9的(4)列所示,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一定程度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假设 H_{2-4} 得到验证。

表9的(5)列将上述所有交乘项纳入,估计结果再次证明,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和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质量溢出效应较小。这些差异化特征与影响机制分析相对应,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机制分析的准确性。

6. 进一步的研究

上述分析表明,在微观产品层面美国对华反倾销促进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那么,其是否也提高了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 本文通过下式测算非倾销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 $QUALITY_{it} = \sum_{h \in \Omega_j} exp_{iht} quality_{iht}$ 。其中, Ω_j 表示企业内非倾销产品的组合, exp_{iht} 表示企业 i 非倾销产品

h 的出口规模占比。非倾销出口产品总体质量的变动可以表示为: $\Delta QUALITY_{it} = \sum_{h \in (SU, EN)} exp_{iht} quality_{iht} - \sum_{h \in (SU, EX)} exp_{iht-1} quality_{iht-1}$ 。其中, SU 为持续出口的产品, EN 为新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 EX 为退出美国市场企业。借鉴 Griliches 和 Regev(1995) 的做法^[41], 进行如下分解:

$$\Delta QUALITY_{it} = \underbrace{\sum_{h \in SU} exp_{iht} \Delta quality_{iht}}_{\text{产品内效应}} + \underbrace{\sum_{h \in SU} \Delta exp_{iht} (\overline{quality_{ih}} - \overline{QUALITY_{ih}})}_{\text{产品间效应}} + \underbrace{\sum_{h \in EN} exp_{it} (\overline{quality_{ih}} - \overline{QUALITY_{ih}})}_{\text{进入效应}} + \underbrace{\sum_{h \in EX} exp_{it-1} (\overline{QUALITY_{ih}} - \overline{quality_{iht-1}})}_{\text{退出效应}}$$

其中,各个变量加上划线表示该变量在相邻两年的平均值,出口产品总体质量的变动分解为4个效应:一是产品内效应,即在持续出口产品的出口份额不变的情况下,由持续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动所引致的总体质量变动;二是产品间效应,即在持续出口产品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持续出口产品出口份额变化所引致的总体质量变动;三是进入效应,即由产品进入出口市场所引致的总体质量变动;四是退出效应,即由产品退出出口市场所引致的总体质量变动。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Delta QUALITY_{it} = \alpha + \sigma_1 \Delta AD_{it} + \sigma_2 \Delta mean_usa_{it} + \sigma_3 \Delta mean_chn_{it} + \kappa_t + \kappa_i + \mu_{it}$$

其中, $mean_usa_{it}$ 为在企业层面平均的美国进口关税, $mean_chn_{it}$ 为在企业层面平均的中国进口关税,各个变量旁边加 Δ 表示该变量在相邻两年的差值, κ_t 为年份的固定效应, κ_i 为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μ_{it} 为误差项。表10给出了估计结果,其中,(1)列的结果显示 ΔAD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受影响中国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2)~(5)列的估计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通过产品内效应和退出效应提高了中国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其中产品内效应是反倾销促进受影响企业

^① 本文借鉴 Mayer 等(2014)的方法^[40],根据产品的市场表现倒推产品的企业内等级,具体地,对初始年份企业内部产品的销售额进行降序排列,定义产品的企业内等级=1,2,...,数值越大,表示该产品在企业内的销售量越小,即产品的企业内等级越低。

非倾销产品总体出口质量提升的主要途径。可见,美国对华反倾销主要通过提高持续出口产品质量促进的非倾销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同时,也迫使低质量产品退出出口市场^①进而提高总体质量。

表 10 反倾销对非倾销出口产品总体质量的提升效应及分解

变量	总体	产品内效应	产品间效应	进入效应	退出效应
	(1)	(2)	(3)	(4)	(5)
反倾销影响	0.133 0**	0.087 7**	-0.003 9	0.017 6	0.031 7*
的差值	(2.455)	(2.278)	(1.053)	(0.457)	(1.36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96 100	96 100	96 100	96 100	96 100
Adjusted R ²	0.168 3	0.189 3	0.151 9	0.194 1	0.202 2

五、结论与启示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逆全球化倾向加强。本文利用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即可以显著提升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美国对华反倾销通过贸易偏转效应提高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非倾销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竞争促进效应),进而促使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和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较小;此外,从总体产品质量的分解看,美国对华反倾销主要通过产品内效应和退出效应(特别是产品内效应)促进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无须惧怕外国对华反倾销的负面影响,因为危中有机,只要能正确对应,及时调整策略,遭遇反倾销也可能为本国企业的升级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更加中性的贸易政策,维护对外贸易市场的公平竞争。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出口企业进行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动力,并且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非国有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动力更足。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需要更加中性。一方面,坚持竞争中性的原则,逐步减少对国有企业在出口补贴、出口信贷方面的不合理优惠,使市场上所有贸易企业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充分地发挥市场竞争对贸易企业的激励效应;另一方面,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通过进口贴息、降低进口关税等措施支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及国内需求较大的部分消费品等的进口,倒逼国内贸易企业进行转型升级。

第二,大力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国外对华反倾销一方面会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因此,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是当前中国稳出口的重要举措之一,必须下大力气狠抓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一是支持各个行业组织制定国际化的先进的出口产品行业标准,推动企业强化质量管理与投入;二是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构建新型出口商品监督抽查模式,实现出口商品监督抽查常态化和全覆盖;三是加强出口产品退运通报召回等的追溯调查工作,强化质量安全事故处置力度,严厉打击出口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① 本文使用企业—产品层面数据的分析也发现,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越低,美国对华反倾销后越可能退出市场。

参考文献:

- [1] LU Y,TAO Z,ZHANG Y. 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91(2):290-300.
- [2] 罗胜强,鲍晓华.反倾销影响了在位企业还是新企业: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例[J].世界经济,2019(3):118-142.
- [3] 王孝松,施炳展,谢申祥,赵春明.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以反倾销为例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4(11):58-71.
- [4] 王孝松,翟光宇,林发勤.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抑制效应探究[J].世界经济,2015(5):36-58.
- [5] 蒋为,孙浦阳.美国对华反倾销、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绩效[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7):59-76.
- [6] 沈国兵.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基于木制卧室家具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4):48-57.
- [7] 向洪金.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75-86.
- [8] 杨仕辉,邓莹莹,谢雨池.美国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2(1):77-84.
- [9] 冯宗宪,向洪金.欧美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理论与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0(3):31-55.
- [10] ZHU M. Multi-product exporters and antidumping: Evidence from China[R]. HECER Discussion Paper No. 419,2017.
- [11] 龙小宁,方菲菲,Chandra P.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种类溢出效应探究[J].世界经济,2018(5):76-98.
- [12] 谢建国,章素珍.反倾销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以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7(1):153-164.
- [13] 钱学锋,王胜,陈勇兵.中国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范围:事实与解释[J].管理世界,2013(1):9-27.
- [14] MANOVA K,ZHANG Z. Export prices across firms and destination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127(1):379-436.
- [15] MANOVA K,YU Z.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qua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7,109(5):116-137.
- [16] BOWN C P, CROWEY M A. Trade deflection and trade depress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72(1):176-201.
- [17] 高新月,鲍晓华.反倾销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J].财经研究,2020(2):21-35.
- [18] 铁瑛,何欢浪.城市劳动供给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本效应”抑或“技能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2019(09):26-39.
- [19] 苏丹妮,盛斌,邵朝对.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8(11):117-135
- [20] 林正静.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国际经贸探索,2019(2):32-53.
- [21] 殷德生,唐海燕,黄腾飞.国际贸易、企业异质性与产品质量升级[J].经济研究,2011(S2):136-146.
- [22] FAN H, LI Y, STEPHEN R Y. Trade liberalization, quality and export pric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97(5):1033-1051.
- [23] 许家云,毛其淋,胡鞍钢.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证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7,40(03):52-75.
- [24] 李坤望,王有鑫.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05):60-66.
- [25] HUMMELS D,KLENOW P.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2):704-723.
- [26] MATSA D A. Competition and product quality in the supermarket industr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126(3):1539-1591.
- [27] HA M N,PIERRE M P. Competition,product quality,and heterogeneous firms[R].CREA Working papers,2013.
- [28] 许明.市场竞争、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9):40-57.
- [29] 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WEI S. Trade Liber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6):2169-2195.
- [30] BRODA C,WEINSTEIN D E.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121(2):541-585.
- [31] BEKKERS E,FRANCOIS J,MANCHIN M. Trade costs,quality and the skill premium[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49(3):1153-1178.
- [32] AMITI M,KHANDELWAL A K. Import competi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3, 95(2)476-490.

- [33] AHN J, KHANDELWAL A K, WEI S.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in facilitating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4(1):73-85.
- [34] 谢中祥, 王俊力, 高丽.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动因——基于企业视角的经验研究[J]. *财贸经济*, 2016(8):97-110
- [35] 樊海潮, 郭光远. 出口价格、出口质量与生产率间的关系: 中国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5(2):58-85.
- [36] 余森杰, 金洋, 张睿. 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衡量与生产率估算[J]. *经济研究*, 2018(5):56-71.
- [37] 刘伟, 蔡志洲, 苏剑.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后果及我国的应对措施[J]. *金融研究*, 2009(6):23-30.
- [38] 许和连, 王海成.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J]. *世界经济*, 2016(7):73-96.
- [39] 周茂, 陆毅, 符大海.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产业升级: 事实与机制[J]. *世界经济*, 2016(10):78-102.
- [40] MAYER T, MELITZ M, OTTAVIANO G. Market Size, competition and the product mix of exporte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495-536.
- [41] GRILICHER Z, REGEV H. Productivity and firm turnover in Israeli industry: 1979—1988[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 65(1):175-203.

Can US Antidumping against China Promote Quality Promotion of China's Non-dumping Export Products?: Research on Spillover Effect of Antidumping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d Its Acting Mechanism

SHEN Lin¹, PENG Dong-dong²

(1. *Concord University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China;*

2.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eaching Sectio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001, Fujian, China*)

Abstract: Antidumping can boost the affected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 export of non-dumping products of the antidumping originator (trade deflection effect), caus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ntensification (competition promotion effect) of non-dumping products in the antidumping originator, and further force the enterprise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non-dumping export product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spillover effect). Based on the micro-data at the enterprise-product level from 2000 to 2013, this article uses DI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US antidumping on China'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of non-dumping produ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S anti-dumping against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xport quality of non-dumping products of the affected companies, which have significant export product quality spillover effect; The trade deflection effect causing the competition promotion effect is the important acting mechanism of the quality spillover effect, thereby, for the non-dumping products, which US has a high dependence on China's imports, many export destinations, high-level intra-enterprise, and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promotion effect of US antidumping against China is little. In addition, the US anti-dumping to China can also force low quality products to withdraw from export market (exit effect) and further to promot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export products while forcing the affected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non-dumping products (intra-product effect). China should implement more neutral foreign trade policy, carry out export product quality promotion project, and sufficiently use the forcing effect of foreign antidumping to China to boos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s well a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xport enterprises.

Key words: antidumping;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spillover effect; trade deflection effect; competition promotion effect; Sino-US trade friction

CLC number: F114; F7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0)05-0082-15

(编辑:段文娟)